

# 仁王護國法會與戰後臺灣社會 （1949-1987）

闕 正 宗

##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臺灣在戰後至戒嚴時期佛教界所舉行「仁王護國法會」的意義。

從中國歷史上來看，「仁王護國法會」的舉辦完全是依據《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內容來進行，希望能達到經上所記載護國、佑民的效果。1949 年之後國府遷臺至解嚴前，臺灣佛教界為因應臺灣身處風雨飄搖的處境，仁王護國法會又以「鞏固領導中心」、「國運昌隆」為思考模式，圖以處理臺灣國際地位不利的變局。隨著經濟的起飛，法會祈求「國運昌隆」的訴求並沒有減少，但是因經濟繁榮所帶來的社會風氣改變，仁王法會也適時加入「淨化人心」等訴求，強烈的反應了時代的性格。90 年代之後，仁王法會成為佛教界的例行公事，過去強烈的政治性格隨之淡化不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變成常見的主張。同樣一部《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隨著時局的推演，展現出不同的風貌，也可看出佛教適應社會與眾生而產生的文化樣貌。

關鍵詞：道安、仁王護國法會、仁王護國波羅蜜多經、臺灣佛教、救護眾生

# The Royal Ceremonials to Protect the Country from Calamities and to Induce Prosperity and Society of Taiwan after the War (1949-1987)

Cheng-tsung Kan\*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oyal Ceremonials to Protect the Country from Calamities and to Induce Prosperity (RCPCCIP) which frequently take place on this island.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a, we have found that the RCPCCIP is held on the basis of the *Sutra of the Benevolent King*, according to which if a ruler is benevolent, then the country will be prosperous. After 1949 and before 1987, Taiwan was working hard to recover her strength, and accordingly the ceremonials often aimed to stabilize the ruling party and to pray for national prosperity. As the economy of the nation began to rise, the ceremonials did not cease to pray for national prosperity. However, as the society was facing new problems caus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s, the ceremonials began to ask for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mind. After the 1990s, the RCPCCIP became a routine, mainly praying for “nice winds and moderate rain” or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civil safety.” It is obvious that the same sutra can be used for different purposes according needs of the time and place.

Key words: Ven. Tao An, Royal Ceremonials to Protect the Country from Calamities and to Induce Prosperity, The Sutra of Royal Ceremonials to Protect the Country from Calamities and to Induce Prosperity, Buddhism in Taiwan, protecting lives from sufferings

---

\* the publisher of the monthly *Everlasting Budhi*. candidate for doctor's degree at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 仁王護國法會與戰後臺灣社會 （1949-1987）\*

關 正 宗\*\*

## 壹、前 言

佛教傳入中國，「報恩」的思想就融合為中國文化的一環，所謂「上報四重恩」，這「四恩」根據《心地觀經》的說法分別是：父母恩、眾生恩、國王恩、三寶恩，而《釋氏要覽》則說四恩為：父母恩、師長恩、國王恩、施主恩。<sup>1</sup>雖然名目有些差異，但是其中的父母恩與國王恩卻是一致的。報父母恩的佛經，真偽姑且不論，像《父母恩重難報經》就是其一；甚至在佛教流通甚廣，為人所持誦的《地藏菩薩本願經》也被認為是孝經。而佛教與政治（國王）的互動關係，梁釋慧皎所著的《高僧傳》卷五記載東晉道安法師曾說過「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sup>2</sup>後來的「三武一宗」法難就見證了道安法師的見解。

唐太宗貞觀 2（628）年於長安諸寺，設齋會七晝夜，行道懺悔，以祈念戰死者的冥福。同年 7 月，詔令京城及天下諸州僧道，為國民祈福，並祈百穀成熟，轉經行道七日七夜。至此每年正月及 7 月成為例行的軍中行事。貞觀 3 年正月，下詔長安沙門，於每月 27 日，轉讀《仁王護國經》，以祈念唐室的安泰與資福國家。到了元世祖至元 7（1270）年，開始有護

---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6 年 1 月 19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6 年 4 月 3 日。

\*\* 菩提長青雜誌發行人，成功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sup>1</sup> 丁福保：〈四恩〉條，《佛學大辭典》（卷上）（臺北：修訂中華大藏經會，1987 年），頁 779。

<sup>2</sup> [梁]·釋慧皎：《高僧傳·釋道安》，卷 5，頁 0352a。

國仁王寺的建立。<sup>3</sup>可見自唐以降，仁王護國的思想已廣為流通，並漸與政治相結合。

「仁王」就是明君，也是佛教所企盼的轉輪聖王。當國有明君，則政治清明、社會祥和、人民安樂，反之則不然，甚至包括佛教在內的宗教，難保命運多舛。「仁王」是內護，是以身作則，仁民愛物；「護國」是外護，需上下一心，團結一致，這是「仁王護國」的根本大意。

民國以來，勸請舉辦仁王護國法會的案例不少，但所圍繞的核心內容皆與時局有關，例如 1925 年春國父孫中山逝世後，北京佛教團體延請太虛大師於中央公園的社稷壇大殿開講《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sup>4</sup>之後歷經北伐、抗戰、內戰，直到國府退守臺灣兩岸對峙。並自 1949 年以降的 20 年間，中華民國的處境常處風雨飄搖之中，「仁王護國」的思維更加濃厚，是故佛教界縑素團體在此一時期時常舉辦「仁王護國息災法會」，藉法會的功德威力，一方面期盼上位者以「仁」治國，另一方面則欲凝聚民心，共渡非常時期。

## 貳、《仁王經》的相關經典內容略釋

關於《仁王經》的相關經典不少，其中以鳩摩羅什譯的《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及不空譯的《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流通比較廣，像是羅什譯本傳到日本後，在齊明天皇 6（660）年於宮中講仁王經以來持續不斷。<sup>5</sup>以下就是相關的經論疏：（如表 1）

<sup>3</sup> 程文熙：〈佛教的四聖諦和仁王經的忍〉，《仁王護國息災法會紀念專刊》（臺北：中國佛教會，1973 年 10 月 3 日），頁 123-124（按：程文熙是轉引自聖嚴法師所譯日人野上俊靜之《中國佛教史概說》一書）。

<sup>4</sup> 蔡運辰：〈追記國父喪事與仁王護國法會〉，《如是庵（念生）學佛臚語（中）》，（臺北：新文豐，1983 年 7 月），頁 881。

<sup>5</sup> 鎌田茂雄等編：《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98 年 8 月），頁 72。

表 1：《仁王經》相關經論疏

經論疏名	卷數	譯作者	成立時間
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	2 卷	鳩摩羅什	AD411
仁王護國般若經疏	5 卷	智顗	AD584
仁王經疏	1 卷	不詳	AD599
仁王般若經疏	6 卷	吉藏	6-7 世紀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	2 卷	不空	AD765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	1 卷	不空	AD765
仁王般若念誦法	1 卷	不空	AD765
仁王般若陀羅尼釋	1 卷	不空	AD765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	7 卷	良賁	AD766
仁王經疏	6 卷	圓測	7 世紀後半
仁王經開題	1 卷	空海	9 世紀前半
佛說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疏神寶記	4 卷	柏庭善月	AD1230
仁王般若實相論	1 卷	顯秀	不明

資料來源：據《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製成。

從以上經、論、疏的傳出年代可以看出，以鳩摩羅什的《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為最早，是在西元 411 年成譯，其後智顗、吉藏等據以作疏。到了西元 765 年，開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三藏，重譯仁王經，名為《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由於不空三藏具密教傳習背景，之後不空所譯有關的《仁王經疏》等無不深具密教色彩。以下就各經疏的大意解釋如下：

一、《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譯：全書 2 卷，以佛陀向十六位國王說法的形式展開，首先，說十三空，其次說十四忍、二諦。進而說明崇敬、讀誦般若經，國王本身在災難來臨時可以獲得守護，為了要讓國王信受此經，佛陀特舉百僧誦持經典，帝釋天退敵的故事以為說明，以勸導諸國王誦讀、廣弘此般若經。<sup>6</sup>

<sup>6</sup> 山口務：〈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多經〉條，收在鎌田茂雄等編：《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頁 71-72。（原日文筆者譯，以下同）。

二、《仁王護國般若經疏》，智顗注：全疏 5 卷，全疏的結構用的是釋名、辯體、明宗、論用、判教的五重玄義（天臺宗獨特的經典解釋法），來概括本經的大綱。其次將經典的本文劃分為序分（序品）、正說分（觀空品以下六品）、注疏通分（囑累品）加以解說。五重玄義第一釋名，是解釋《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的經題；第二辯體，是說明圓教實相為本經之體（本質）；第三明宗，是解明般若智慧修行的宗旨；第四論用，是說明本經的功用，佛的智慧常守護國土、防止災難，常護眾生、能得佛果；第五判教（教相），是解釋屬於五時的第四般若時、五味的第四熟酥味。本疏講解於金陵（南京）的光宅寺，由弟子灌頂筆記，但晁說在本疏的序文中表示，本疏在中國本土唐末以後失傳，宋代四明知禮要求日本源信將本疏回傳未果，後在元豐年間（1078-1085）復再流傳。<sup>7</sup>

三、《仁王經疏》，注者不詳：1 卷（殘卷），欠卷首，是記載佛十大弟子阿難的傳記，其次是在有關「如是我聞」中，詳細列舉聲聞藏、菩薩藏加以說明。《佛說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是以真性為宗，是如來聖弟子之說。本書雖只是《佛說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注疏的一部分，但是，由於此注疏甚古老，故顯得十分珍貴。另外，在末尾記有「開皇十九（599）年六月二日」，不過成書的年代或許是更早。原本是敦煌出土寫本編號第 S2502，但份量極少。<sup>8</sup>

四、《仁王般若經疏》，吉藏注：6 卷，是吉藏對《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的注釋，全疏的結構是仿照天臺智顗的五重玄義的條例，立出釋名、出體、明宗、辯用、論相五章，但疏中隨處引用《仁王經疏》所說。在經典本文的解釋上，序品作為序分、觀空、教化、二諦、護國、散華、受持六品作為正說分、囑累品做流通分來加以注釋。在序分開頭，陳述四對經序，即證信、發起二序，通別二序，阿難二序，經後、說經時二序。

<sup>7</sup> 仙石景章：〈仁王護國般若經疏〉條，收在鎌田茂雄等編：《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頁 477。

<sup>8</sup> 柿市里子：〈仁王經疏〉條，收在鎌田茂雄等編：《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頁 811-812。

在正說分說觀空、教化、二諦三品是能護的般若，此謂內護。其次說護國品是所護的國土，此謂外護。附帶要說的是，關於能護之般若與所護之國土，釋經名謂：「施恩布德故名為仁，統化自在，故名為王。所謂護國，仁王是能護，護國是所護。仁王如法治道，萬民適樂，國土安穩。若仁王望般若，般若是能護，持般若由故，仁王安穩。今仁王與般若皆是能護，國土是所護。」此是引智顗之解釋。<sup>9</sup>

五、《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不空譯：全書 2 卷，是改訂自《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sup>10</sup>二經內容大同小異。

六、《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不空譯：全書 1 卷，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奉持品》語句的注釋，說明建立是因為護國而修習仁王經法的曼陀羅之儀軌及修法次第，內容分為明五菩薩現威德、建立曼陀羅儀軌、釋陀羅尼文字觀行法、陀羅尼觀想布字輪五種。此一儀軌同時促成了日本真言宗作為護國秘法的仁王法成立。<sup>11</sup>

七、《仁王般若念誦法》，不空譯：全書 1 卷，是基於《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所修的仁王經法修法次第而說，內容上大體與《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所說的〈入道場儀軌〉相同。最後在解釋般若菩薩的根本印中，僅說明與同經〈奉持品〉所舉的陀羅尼不同之處。<sup>12</sup>

八、《仁王般若陀羅尼釋》，不空譯：全書 1 卷，是注釋《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奉持品》中所說的金剛手、金剛寶、金剛利、金剛藥叉、金剛波羅蜜多五大菩薩與陀羅尼。陀羅尼的注釋大約是根據《仁王護國般

<sup>9</sup> 仙石景章：〈仁王般若經疏〉條，收在鎌田茂雄等編：《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頁 477-478。

<sup>10</sup> 山口務：〈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條，收在鎌田茂雄等編：《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頁 72。

<sup>11</sup> 福田亮成：〈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條，收在鎌田茂雄等編：《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頁 291。

<sup>12</sup> 元山公壽：〈仁王般若念誦法〉條，收在鎌田茂雄等編：《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頁 291。

若波羅蜜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釋陀羅尼文字觀行法》的注釋。<sup>13</sup>

九、《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良賁注：全書 7 卷，全書的構成，首先是釋經題，其次是釋經文。全書分四部分，一是敘述經起之意，二是明經之宗體，三是敘述所攝所被，四是正解本文。在釋經名上曰：「仁王護國標請主所為，般若波羅蜜多明境智幽玄。仁王五常之所；王者統冠三才；護乃悲力濟時；國者所居闔城；般若破淨慧、識浪之煩籠；波羅為彼岸，即清淨室宅；蜜多謂離義、到義；經謂連綴攝持。」<sup>14</sup>

十、《仁王經疏》，圓測：全書 6 卷，分四章，第一章說經意及釋題目，陳述三般若（實相、觀照、文字）經中之旨，並解說經名之由來；第二章辯所詮之宗及能詮之教體，略作三釋：介紹三種般若為宗之說、真俗二諦為宗之說、三法輪中無相輪為宗之說；第三章顯教之所依及所為之有情，以明本經所屬與說法之對象；第四章在翻譯年代及依文正釋上，首先介紹三種翻譯：一晉泰始元（265）年法護譯；二姚秦弘始 3（401）年羅什譯；梁承聖 3（554）年真諦譯。其次分別解釋經典本文的序分（序品）、正說分（觀空品、教化品、二諦品、護國品、散華品、受持品）、流通分（囑累品）三部來解釋，更進一步將正說分分為三部分，即最初三品，以明內護（能護之般若），陳述護國品為外護（所護之國土），解明散華、受持品國王報恩供養之意義，並陳述受持本經之功德。後世給予本書注釋的內容極高評價，後傳入日本，奈良法隆寺行信的《仁王經疏》依本經之處甚多。<sup>15</sup>

十一、《仁王經開題》，空海注：是《佛說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的注解，全書 1 卷，空海將本書分為三部分：一經起之意，二經題之釋，三本文之釋。更將本文之釋分為來意、品名、釋本文三部分。又將釋本文三分為，勅恥勸持、護法、得益；關於經題謂仁王的「仁」是人，是以上下

<sup>13</sup> 元山公壽：〈仁王般若陀羅尼釋〉條，收在鎌田茂雄等編：《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頁 291-292。

<sup>14</sup> 仙石景章：〈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經疏〉條，收在鎌田茂雄等編：《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頁 478-479。

<sup>15</sup> 仙石景章：〈仁王經疏〉條，收在鎌田茂雄等編：《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頁 478。



相親之人，「王」而獲得人人之尊重。空海視仁王經為護國經典。<sup>16</sup>

十二、《佛說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疏神寶記》，柏庭善月注：全書 4 卷，首談玄（懸）義，注釋《仁王經疏》的五重玄義（釋名、辯體、明宗、論用、判教的天臺經典解釋法），其從第一卷的一半，依文申釋，解釋序品比下的各品。本注釋書的作者是趙宋天臺四明派的學者，其學說被評為正確。<sup>17</sup>

十三、《仁王般若實相論》，顯秀作：全書 1 卷，是欠缺首部的殘簡本，為注釋《佛說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第六散華品、第七受持品、第八囑累品的經書。原本為敦煌出土寫本，為中村不折氏所藏，題末及後記謂：「仁王般若實相論卷二、比丘顯秀寫、流通後代代化不絕」。<sup>18</sup>

以上就是《大正藏》有關《般若波羅蜜多經》、《疏》的簡單介紹，漢傳佛教的「仁王護國」思想，除了在中國本土的影響外，還進一步影響了日本與朝鮮，歷代都有人提倡，以因應時代的變局。

### 叁、抗戰前後從事的仁王護國法會思想

佛教東傳中國後，在民間與道教發生衝突，在文化背景上與儒家有些扞格，但是，很快地在雙方的磨合、借鏡下，儒、釋、道甚至成為中國三大教，不過，上位者由於政治或信教的因素，佛教也不免遭受打壓，如「三武一宗」的法難就是。佛教與儒道的民間衝突，只要沒有政治力的介入，基本上局面是可以控制的，一旦衝突在上層點燃，若是上位者傾向於他教，則「破佛事件」難免，而早期道教每每質疑佛教是與國家利益相違背的，例如作〈三破論〉的梁道士張融攻擊佛教是破國、破家、破身的邪教，東

<sup>16</sup> 笠井哲：〈仁王經開題〉條，收在鎌田茂雄等編：《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頁 647。

<sup>17</sup> 仙石景章：〈佛說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疏神寶記〉條，收在鎌田茂雄等編：《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頁 477。

<sup>18</sup> 柿市里子：〈仁王般若實相論〉條，收在鎌田茂雄等編：《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頁 811。

晉的慧遠大師在〈沙門不敬王論〉則加以反駁。<sup>19</sup>也就是說，外教常會有意無意地將佛教異於中國文化的傳統，刻意作政治性的解讀，故當東晉的道安法師說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就一點也不足為奇了。

民國肇建，國事蝸蟻，佛教的生存發展面臨諸多危機，僧人太虛登高改革佛教，一呼百應，此為眾所周知。然國土不靖，即使改革有成，亦難以自活，加上改革需要在穩定的環境中進行，這時候訴求仁王護國，自利利人，例如 1922 年漢口佛教會就勸請佛教界講讀《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時，就以天災人禍為訴求：

清末來外患內訌，逼成革命，改政共和，十一年中，無有一年舉國無兵匪戰爭燒搶。少則於一省二省戰爭燒搶，多則牽連於多省乃至全國戰爭燒搶。國民生命財產之被殺傷損害者，何可勝計。凡是固執為之而致此哉。則物欲之橫流愈甚，而我私之熾盛彌高之所成也。人禍既極，天災併集。……探果窮因，自須人人發本心之慧光，一照空物欲我私之惑障。……惡業方熟，苦報已現之際，無論人心之不易惺然徹覺，即能惺覺，亦不能頓救，是非仗諸佛及登地諸菩薩所證成果德之法，以不可思議之感應力，乃可挽轉。佛菩薩果上無漏淨功德之源海，唯般若經是依。故欲求頓得消國災而獲民福，皆須受持讀解誦說此般若波羅蜜多。<sup>20</sup>

這裡提到，在天災人禍中，光靠自己的力量已不足以頓救，必須要仰賴佛菩薩的力量才能消災獲福。所以接著又說明「仁王護國」的意義為：「仁王必護國，護國必仁王，不仁王則不護國，不護國則不仁王。而如何得成仁王護國，則非般若波羅蜜多之力不為功也。」

漢口佛教會勸請佛教界講讀《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後續如何並不清楚，但是可以知道的是天災人禍依然持續，例如 1925 年農曆 2 月

<sup>19</sup> 中村元等：《中國佛教發展史》（臺北：天華公司，1984 年 5 月），頁 19。

<sup>20</sup> 漢口佛教會：〈普勸各地佛教叢林學社教會寺庵講讀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為國為世界祈求平安啟〉，《海潮音》，第 3 年第 5 期（1922 年 6 月 16 日），頁 4-5。

11 日，北京政府禮請太虛法師在中央公園主持護國法會，所提出的理由是：「政府諸公痛戰爭未息，水旱頻仍，民不聊生，國將不國，非提倡慈悲主義，不足以救人心而挽劫運。爰發起仁王護國般若終（？）法會。」<sup>21</sup>就在法會期間，恰逢國父孫中山先生過世，治喪處於 3 月 13 日請求正在北京中央公園舉行法會的佛教單位能移往他處，原因是中央公園社稷壇是紀念中山先生最佳場所。<sup>22</sup>後來中山先生紀念追弔會還是順利在中央公園社稷壇開弔七日。<sup>23</sup>

因國局不靖而發起的仁王護國法會所在多有，像黨國大老戴季陶（傳賢，1891-1950），為虔誠奉佛的佛教徒，<sup>24</sup>主張佛教救國。他在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同年 11 月 16 日請修仁王護國法事，撰〈仁王護國法會發願文〉勸修仁王護國法事，文曰：

憂患日深，國難日亟，夫天助自助之人，佛度自度之眾，國事之危，天災之重，皆國人共積之罪業所召。惟有痛自懺悔，矢志自新，斯可消除宿業，重開福運，出斯民於水火。國家如泰山，敬以至誠，發十願心，聯合同志，虔請百師修仁王護國之法，繼普明宏道之願。<sup>25</sup>

除了勸請普修仁王護國法事外，戴氏本身亦身體力行，他說：「民國二十年，倭寇侵我東省，是年冬，京中信奉佛法諸人，發起於寶華山隆昌寺

<sup>21</sup> 〈北京政府請太虛法師在中央公園社稷壇建設護國法會紀事一束〉，《海潮音》，第 6 年第 3 期（1925 年 4 月 13 日），頁 1。

<sup>22</sup> 〈孫中山先生治喪處覆函〉，《海潮音》，第 6 年第 3 期（1925 年 4 月 13 日），頁 10。

<sup>23</sup> 釋妙然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臺北：海潮音雜誌社，1995 年 1 月），頁 110。

<sup>24</sup> 他自述：「余家自祖母以來，奉佛敬神，尊祖孝親，備極虔誠。而我慈母黃太夫人信佛尤篤，余自幼受此教化，對釋迦教義，若具善根。」其德配鈕氏，法名蓮花，亦虔誠佛子，婚嫁前曾一度出家，終以母命難違而反歸，參見東初：〈戴季陶先生與佛教〉，《戴季陶先生佛學論集》（臺北：華嚴蓮社、菩提佛堂，1985 年 5 月），頁 5-6。

<sup>25</sup> 戴傳賢：〈仁王護國法會發願文〉，《海潮音》，第 13 年第 5 期（1932 年 5 月 15 日），頁 1。

修仁王護國般若法會，次年秋，余於潛園之守先閣，虔誦般若，心有所感，因撰仁王護國般若頌。」此於潛園守先閣所作之〈仁王護國般若密多經頌〉（按：《仁王護國般若密多經》的「密」與「蜜」字時而互用，此「密」為原字），共二十頌，除第二頌的「敬禮國父孫先生，敬禮建國諸仁者」及第十頌的「八德不異八聖道，三民主義等三歸」外，所有偈頌是傳統佛教用語。<sup>26</sup>潛園守先閣所作之〈仁王護國般若密多經頌〉時間為1932年8月6日，第二次作〈仁王護國般若密多經頌〉是在1934年11月17日的江蘇省寶華山。<sup>27</sup>

戴氏的佛教救國，除了表現在勸修仁王護國法事外，還有藥師法會（誦《藥師經》）、護國息災法會（誦《大悲心陀羅尼》）等等。<sup>28</sup>這種佛教救國思想，其實是當代佛教徒所共有之特質。這種佛教救國思想的特色不外為，一希以法會消除、減輕共業；二希以法會消災免難；三希以法會降伏敵人。例如「七七事變」後一年（1938年8月23日），當時的監察院長于右任，以及張繼、王震、杜鏞、屈映光、朱慶瀾、焦易堂等共同致蔣總裁通電謂：「漢口蔣總裁鈞鑒：外侮日亟，國難嚴重，前方將士，浴血抗戰，後方人民僧侶，以及川康、蒙、藏素信佛教之廣大群眾，咸欲設壇修法，降伏暴魔，為國祈禱，行為雖異，愛國則同。右任等觸目悵懷，隨緣發心，擬鳩資十萬元，敦請大德，並發動全國僧眾，在康藏蒙古暨佛法勝地，分別建立護國法會，上祈建國抗戰勝利，次為死難將士同胞超荐，仰慰忠靈。……」

29

佛教救國思想一方面是報恩，一方面則是消災。報四恩中的國家恩，其實就是護國，所以在談到佛教的護國時，太虛法師還是引《仁王護國般

<sup>26</sup> 戴季陶：〈仁王護國般若密多經頌〉，《戴季陶先生佛學論集》，頁76-79。

<sup>27</sup> 戴季陶：〈仁王護國般若密多經頌〉，《戴季陶先生佛學論集》，頁77-79。

<sup>28</sup> 戴季陶：〈藥師七佛法會發願文〉、〈護國息災會祈願文〉，《戴季陶先生佛學論集》，頁118-124。

<sup>29</sup> 葦舫：〈讀監察院于院長等致蔣總裁建立護國法會電後〉，《海潮音》，19卷9號（1938年9月15日），頁2。

若波羅蜜多經》思想說：

何以言護國應變耶，則如護國般若經所說，乃因其國家民族，或有內盜竊發，或有外寇侵逼，或有天災橫溢，大抵由種種禍變災難之凌迫，故國之須護，已是國之不幸，須護而不能護，國則危亡，須護而能護，國必存而復昌，而護之道，由當居率全民協修德慧，感格佛天，從禍源上消解而共慶安善，則如護國經之所說。他若內凝眾力，外集多援，禦兇暴之寇，使形格勢禁而不能逞，馴致潰退，如中國今日所從事者，亦為護國之常道。要之自力為主，他力為助，須得他力之助亦殊重要，斯所以國際間有其餘力之國族，當以助他而成自助，共同制裁侵略國使不能為害也。

30

自力與他力，自助與他助是上述的核心觀點，不過主政者修德慧「感格佛天」才是消除禍源根本之道，這是「仁王」的條件之一。「內凝眾力」是自力、自助，「外集多援」是他力、他助，這兩個要件具備則是退敵之常道。

中日戰爭爆發後數年，日軍雖無法「三月亡華」，但亦勢如破竹，席捲各地，最高佛教組織中國佛教會於1938年6、7月間設臨時辦事處於重慶，到了8月，川、黔、湘、雲、桂、陝、甘、豫、皖等省響應，同時開會決定停止原設於上海淪陷區的中佛會職權，由重慶臨時辦事處代行。<sup>31</sup>1939年3月中，重慶各界發起「護國息災法會簡章草案」，將護國法會組織化，承「林（森）主席、蔣委員長贊許」，而戴傳賢、于右任等要人亦名列其中。簡章草案共四條，除第四條為理事會選舉辦法外，前三條內容分別為：第一條，本法會定名為護國息災法會；第二條，本法會，以懺除眾生業障，追薦陣亡將士死難同胞，虔求抗戰勝利，護國救民為宗旨；第三條，本法

<sup>30</sup> 太虛：〈佛教的護國與護世〉，《海潮音》，20卷1號（1939年1月15日），頁10

<sup>31</sup> 釋妙然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頁195。

會設於重慶，于各地名山大寺，分設道場。<sup>32</sup>

至此，戰時的護國（仁王）法會進入另一個組織階段，並持續結合時局的脈動從事護國、消災、退敵的工作，其情況隨國府遷臺而進一步深化。

## 肆、戰後臺灣的仁王護國法會背景分析

當「護國」已成為中國傳統佛教一環的同時，正如抗戰前後在什麼樣的時機與背景，展現出具體作法就非常重要。戰後臺灣佛教，由於兩岸的分離與對峙，鞏固領導中心、穩定社會民心，就成為戒嚴時期的普遍思維，為了要讓社會國家安和樂利，講經說法或舉行法（戒）會，無疑是佛教最通用的法則。要展現佛教「護國」的理念，除了誦《仁王經》之外，也可表現在其他方面，如傳戒可稱為「護國千佛三壇大戒」，消災可名為「護國消災祈福法會」等等不一而足。

戰後臺灣佛教「護國」的理念最常表現在舉行仁王護國法會及誦念、講解《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上面，以下就是佛教界歷年所舉行的護國法會不完全的統計表：<sup>33</sup>

<sup>32</sup> 〈重慶各界發起護國息（災）法會〉，《海潮音》，20 卷 3、4、5、6 號合刊（1939 年 6 月 15 日），頁 58-59。

<sup>33</sup> 本表乃整理自釋妙然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以及《菩提樹》佛教雜誌等刊物而成。有\*標誌的表示確定有誦仁王護國經。

表 2：護國法會統計表

時 間	地 點	發 起 者	主 壇 者
1950 年	臺北善導寺	李子寬	智光、大醒 <sup>*</sup>
1951 年	臺北善導寺、十普寺	李子寬	章嘉、南亭 <sup>*</sup>
1955 年	臺南湛然精舍	慧峰	慧峰
1957 年	臺北善導寺	中佛會	甘珠、太滄 <sup>*</sup>
1962 年	高雄法華精舍	南部 18 佛教團體	
1972 年	中華居士會	居士會	樂觀 <sup>*</sup>
1973 年	臺北善導寺	中央民代	甘珠、白聖、南亭 <sup>*</sup>
1973 年	北埔濟化宮	新竹縣佛教會	法淨
1974 年	臺北善導寺	中央民代	南亭、甘珠 <sup>*</sup>
1975 年	臺北善導寺	中央民代	<sup>*</sup>
1978 年	臺北善導寺		淨空等 <sup>*</sup>
1979 年	臺北華嚴蓮社	華嚴蓮社	南亭、悟明、靈根 <sup>*</sup>
1981 年	中華居士會	居士會	演培 <sup>*</sup>
1984 年	中華居士會	居士會	<sup>*</sup>
1985 年	臺中慈善寺	中佛會	白聖等 5 人 <sup>*</sup>
1986 年	高雄元亨寺	中佛會	白聖 <sup>*</sup>
1987 年	臺北臨濟寺	中佛會	白聖 <sup>*</sup>
1987 年	臺中大覺寺	臺中市佛教會	<sup>*</sup>
1988 年	臺北善導寺	中佛會	白聖、悟明 <sup>*</sup>
1989 年	臺北善導寺	中佛會	悟明 <sup>*</sup>
1990 年	臺北妙侑寺	中佛會	悟明 <sup>*</sup>
1991 年	臺北善導寺	中佛會	悟明 <sup>*</sup>
1998 年	臺北善導寺	北縣市佛教會	超塵等 <sup>*</sup>

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整個法會的背景，舉行仁王法會的因緣雖各有不同，但以祈求護國、消災、免難為主。以下就是代表性法會的背景分析：

一、1950 年 4 月 5 日至 11 日，李子寬發起舉辦的「仁王護國消災薦亡法會」是由黨國大老，也是善導寺的管理人李子寬居士所籌劃，並商請

當時的立法院院長居正出面邀請名流巨宦擔任發起人，壇分二寺，由大醒法師於善導寺主經壇、智光法師於十普寺主淨壇，當時為臺北市兵役科占用的善導寺大殿，還臨時讓出以供法會使用。<sup>34</sup>關於啟建仁王法會一事，是發起人李子寬甫從達超尼法師處取得善導寺的管理權後不久之事。<sup>35</sup>

國民政府是在前一年（1949年）11、12月間正式由重慶遷臺，兩岸情勢詭譎，臺灣風雨飄搖，在這種政治不確定的因素下，舉辦仁王護國法會是有其深意的。此為戰後臺灣第一次的仁王法會，前後共舉行七天。

二、1951年3月13日至26日，當時的善導寺護法會居正、趙恆惕、吳經明、孫張清揚等，以「大陸戰亂，百姓苦難」共商啟建護國仁王法會，除了壇場外，還請南亭法師宣講《仁王護國般若經》。<sup>36</sup>此次法會前後共舉行十四天，章嘉大師主密壇，修尊勝佛母大白傘蓋法，南亭法師主經壇，誦《仁王經》。<sup>37</sup>關於這段因緣，南亭法師表示：

大陸淪陷，被屠戮之同胞不可勝數，在臺者亦惶惶不安。李子老請居覺生、趙夷午、吳經明、孫張清揚諸居士及余，商議啟建仁王法會，以慰人心。……做緣起文，分函總統蔣公及各院部長。蔣公復函，請居覺老代表拈香。……農曆二月初六日，仁王般若法會開始，白天誦經，晚上由我宣講。另設密壇，由章嘉大

<sup>34</sup> 釋妙然編：《民國佛教大事年記》，頁276。

<sup>35</sup> 李子寬：《百年一夢記》（自署出版，1961年），頁337-338。文曰：「我接管（善導寺）後，赴居覺生院長家，請發起啟建仁王護國消災薦亡法會。我將啟事擬妥請他簽署，他說過幾日來取。適值卅九年元旦，中央各部會首長，皆到，居公發賀年。居院（長）即請他們簽名……居院長領首，其次有張岳軍先生等，憑此可以號召，重視護國息災法會，於是組織兩壇，經壇設於善導寺，大醒法師主壇，淨壇設於十普寺，智光老法師主壇，七日法會圓滿。」另參見南亭法師：《南亭和尚自傳》，收在《南亭和尚全集（上）》（臺北：華嚴蓮社，1994年5月），頁154。關於此一法會，南亭法師表示：「四月五日，前司法院者居覺生正居士，與李子老發動，啟建仁王護國息災法會。顯壇設十普寺，念佛七由智老人主七；密壇設在善導寺，由章嘉大師領導。」

<sup>36</sup> 陳慧劍：《南亭和尚年譜》（臺北：華嚴蓮社，2002年6月），頁126。另參見《覺生》，第9期（1951年3月31日），頁2。

<sup>37</sup> 李子寬：《百年一夢記》，頁346。



師加持護國神咒。唯祈國家安寧，民豐物阜，是為至禱。……余於仁王法會中提議：會後上下午之念彌陀、金剛應改誦仁王般若。值此國難之秋，應以護國護民為先務……會後遂決遵行。一星期後，間接、直接聽到李子老說：善導寺為淨土宗道場，仍以念佛為宜。予於誦經終了時，告眾曰：「余以為，國難方殷，以護國護民，誦仁王經為適當。有人以為，本寺為淨土宗道場，應該念佛。何者為是，取決於眾。」省主席吳國楨之尊翁吳經明老居士起立言曰：「為護國護自身起見」應誦仁王經！大眾多鼓掌贊成，於是決定。<sup>38</sup>

1951 年是國民政府遷臺的第二年（事實上僅一年四個多月），政治局勢漸漸步上穩定期，由於前一年（1950）6 月 25 日韓戰爆發，27 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臺灣海峽中立化」，命第七艦隊巡防臺海。<sup>39</sup>中共參與韓戰，這一年美國派遣「軍事援華顧問團」來臺，<sup>40</sup>穩定了臺灣的民心。因此，在此時舉行「仁王護國法會」應有其時機上的考量的。

三、1957 年 10 月 11 日，中佛會主辦「護國息災法會」在臺北善導寺舉行一永日，名目是「祈禱國運昌隆，追薦死難同胞」，法會分顯密二壇，密壇由甘珠爾瓦主持，顯壇由太滄法師主壇。<sup>41</sup>所謂「祈禱國運昌隆，追薦死難同胞」是指為大陸六億受難同胞祈禱息災暨三千萬死難同胞、陣亡將士追悼超薦，並祈禱反共勝利、國運昌隆。當時出席法會的有考試院長莫德惠、內政部長王德溥、副總統代表王壯為、土耳其大使及各國外交使節數十人，新聞局並拍成紀錄片。<sup>42</sup>

<sup>38</sup> 南亭法師：《南亭和尚自傳》，頁 163-164。

<sup>39</sup> 遠流臺灣館編：《臺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 年 10 月，三版），頁 170。

<sup>40</sup> 祝賀恩師八智嵩慶禮贊會：《白聖上人光壽錄》（臺北：十普寺，1983 年），頁 274。

<sup>41</sup> 釋妙然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頁 322。

<sup>42</sup> 《菩提樹》，第 60 期（1957 年 12 月 10 日），頁 42。另參見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道安法師遺集（八）》（臺北：道安法師紀念會，1980 年 11 月），頁 1950-1951。

四、1972年3月29(19)日，中華佛教居士會啟建「護國法會」，由樂觀法師主壇誦《仁王經》。<sup>43</sup>此護國法會主要是由國民大會百人學佛代表所啟建，法會的目的有三：(1)祈禱總統連任，中華民國國運昌隆。(2)祈禱總統政躬康泰，領導海內外同胞，早日光復大陸，解救苦難同胞。(3)祈禱中華佛教復興，佛法宏揚於世界。除了法會之外，並由李子寬居士主持座談會，通過以「仁王護國般若法會」名義上總統致敬文。<sup>44</sup>

五、1973年2月15日至21日，「中華民國各屆仁王護國息災大法會」是一次「特殊」的法會，關於法會的緣起，協辦的弘化五院表示：「癸丑年仁王護國息災大法會，由中央民意代表發起，中國佛教會主辦，弘化五院負責。延請高僧二百餘人，講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七永日，期以至誠，消弭赤化浩劫，早日收復大陸故物，解救苦難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也。此次法會，在臺灣啟建，實屬空前。經由文殊大士默默主持督導，感化十方，群眾努力，萬姓朝拜，皆人神契合之所致也。」<sup>45</sup>由於主導者的弘化五院<sup>46</sup>主張五教合一，此團體甚至被質疑為「外道」，因為其似乎用「扶鸞」的方式請出所謂的文殊、濟公的「訓示」。<sup>47</sup>雖然如此，此仁王法會盛況並不亞於歷年的場景。

---

《南亭和尚自傳》則說：「中國佛教會假善導寺舉行護國息災法會，實際供美國人攝影。事前經悟一、星雲、廣慈三法師多方籌備，特別辛勞。」頁261。

<sup>43</sup> 釋妙然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頁440。

<sup>44</sup> 《菩提樹》，第233期(1972年4月8日)，頁49。上總統致敬文全文如下：「總統蔣公鈞鑑：第一屆國民大會佛教徒代表李鴻基、王天鳴、劉泗英、周邦道、李謩等一百餘人，暨中華佛教居士會同仁，於本年三月十九日，在羅斯福路四段，中華佛教居士會所，恭請樂觀法師主壇，啟建仁王護國般若法會，虔誦般若波羅蜜(蜜)多經，祝禱國運昌隆，總統康泰，敬以微忱，上達睿察，仁王護國般若法會全體同叩。」

<sup>45</sup> 不著撰人：《癸丑仁王護國息災大法會實錄·序》(1971年)。

<sup>46</sup> 此五院是指：內湖弘化禪院、永和弘化院、三重弘化蓮院、陽明山弘化靜修院、新店弘化清淨院、臺北弘化萬華分院(按：此處共有六院，但原文卻說五院，是否萬華分院不算獨立之一院？)。

<sup>47</sup> 不著撰人：《癸丑仁王護國息災大法會實錄》，頁52。文曰：「弘化雖然闡揚五教，世尊主持傳法道，他人不知此內容，竟說弘化是外道。」

本次仁王法會也與 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的情勢有關，<sup>48</sup>中央民代張知本等一百二十多位發起，白聖法師及香港覺光法師任總主壇，密壇則由蒙古籍甘珠爾瓦與西藏籍的格賴達吉主持，南亭法師主講《仁王經》。前來上香的中央官員有總統府秘書長鄭彥棻、教育部長蔣彥士、立法院副院長劉闊才、蔣緯國、郭澄、張寶樹、邱創煥、內政部長林金生、司長居伯均、孔德成、劉先雲、李熙謀等人。<sup>49</sup>當時的副總統嚴家淦也在法會頭一天親臨拈香。<sup>50</sup>

此次由中央民代發起啟建「仁王護國息災法會」，並有劉韻石撰寫緣起一文：

溯自共匪倡亂，邦家鼎沸，政府為求維護憲政法統，播遷臺員，各中央民意代表，追隨總統蔣公，竭智盡忠，並鼓吹中興，企求早日光復大陸故物，無如念餘年來，迄未達成願望。

比更洪潮橫流，天下滔滔，爭城掠地，塗炭生靈，世界各地，災禍頻仍，骨嶽血淵，慘痛曷極。佛說仁王護國經云：「若於是經受持讀誦解說，一切所求，皆得滿足。」我佛抱大慈大悲之心，發大喜大捨之願，開示此仁王護國經典，以護國安邦，歷經諸大德之誦持，皆能應驗不爽，足見正法昌隆，可使五方降吉祥也。……

代表等爰遵照佛說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之儀軌，請百法師……啟建仁王護國息災大法會，虔誠恭誦並解說是經七永日，祈禱總統蔣公暨文武百官政躬康泰，國運昌隆，鞏固復興基地，解救大陸同胞。<sup>51</sup>

不過，從法壇會場將「總統蔣公長生祿位」擺放在中央來看，<sup>52</sup>這場

<sup>48</sup> 《菩提樹》，第 244 期（1973 年 3 月 8 日），頁 48。

<sup>49</sup> 《菩提樹》，第 244 期，頁 48。

<sup>50</sup> 法會專刊編委會：《仁王護國息災法會紀念專刊》（新聞剪輯）（臺北：中國佛教會，1973 年 10 月），頁 95-97。

<sup>51</sup> 不著撰人：《癸丑仁王護國息災大法會實錄》，頁 53。

<sup>52</sup> 法會專刊編委會：《仁王護國息災法會紀念專刊》，法壇平面圖，頁 47。

法會的訴求主要的目的之一應是「為元首祈康泰」。<sup>53</sup>在七天法會結束前夕，護國法會請總統府秘書長鄭彥棻代呈致敬電文曰：「冀藉我佛大悲願力，消救空前劫難，並願以此功德，獻祝上自領袖，下至黎元，康寧壽考，景福無疆……。」<sup>54</sup>

1973 年這一年蔣介石總統的健康引人揣測，一年多以來總統府沒有發布過蔣總統的任何一張照片，7 月 24 日所發的照片是蔣孝勇夫婦新婚與蔣總統及夫人四人的合照。隨著這張照片的發布，報刊也適時說明總統的健康狀況：「接近總統的人士說，總統健康業已復原，足以恢復部分公務，有時批閱政府報告，每日接見行政院蔣院長，商談重要公務。總統並常在官邸特設之放映室中，欣賞電影，且不時作輕便的散步。」<sup>55</sup>據日本《思想新聞報》8 月 5 日的報導謂：「之前傳聞蔣總統健康違和的消息應該是中共惡意的放話有關。」<sup>56</sup>

六、1974 年 2 月 9 日至 15 日，繼前一年的仁王護國法會，這一年再次由中央民代發起啟建「仁王護國息災大法會」在臺北善導寺舉行，是為第二屆。<sup>57</sup>由南亭法師、甘珠爾瓦主壇，道安法師講經。<sup>58</sup>

南亭法師在法會開示中表示：

……我們去年為總統為國家所舉辦的「仁王護國法會」，業已得到了殊勝的感應，這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事實。記得去年本省曾經兩次威力強大的颱風過境，可是兩次暴風都轉變了方向而去；使本省只遭受極其輕微的災害。去年以來，舉世能源缺乏物

<sup>53</sup> 白聖：〈仁王護國息災法會暨紀念專刊緣起〉，《仁王護國息災法會紀念專刊》，頁 11。

<sup>54</sup> 法會專刊編委會：《仁王護國息災法會紀念專刊》，新聞剪輯，頁 99。

<sup>55</sup> 法會專刊編委會：《仁王護國息災法會紀念專刊》，新聞剪輯（《聯合報》7 月 25 日消息），頁 101。

<sup>56</sup> 法會專刊編委會：《仁王護國息災法會紀念專刊》，新聞剪輯，頁 104。

<sup>57</sup> 祝賀恩師八秩嵩慶禮贊會：《白公上人光壽錄》，頁 690。

<sup>58</sup> 釋妙然編：《民國佛教大事年記》，頁 452。

價飛漲，以致人心惶惶民不聊生。而我寶島臺灣，也僅只掀起了極其輕微的波動。—這些殊幸的造化，皆是「般若」經功的不可思議。「般若」的不可思議，即是「佛法」的不可思議。<sup>59</sup>

本次的仁王法會前來上香的黨政要員計有：副總統嚴家淦、總統府秘書長鄭彥棻、蔣緯國將軍、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臺灣省主席謝東閔、中研院院長錢思亮、臺北市長張豐緒等二百餘人。<sup>60</sup>

七、1975年2月18日至24日，由中央民代發起的仁王護國法會在善導寺舉行，是為第三屆。依慣例仍設顯密二壇，顯壇由白聖、道安、南亭、慈瑞、戒德、覺光、煮雲等十七位法師主壇諷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密壇由甘珠爾瓦、格賴達吉主壇。前來上香的有總統府秘書長、監察院長、立法院長、司法院長、考試院長，以及各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級民代等。<sup>61</sup>本次仁王法會的主題功德是：「祈禱國運昌隆、世界和平、眾生得救。」<sup>62</sup>

此次仁王法會所代表的意義，仁化法師說：

今世普遍是天災人禍，其由來也，非伊朝夕，我政府首長與民意代表正信大德啟建仁王護國法會，是要普化人心急造切實之善因，以救吾人本身，急造宏大之善因，以救吾眾生……。

今啟建仁王護國法會，而欲亟造善因，其善果，或一二年後而收之，或十餘年後而收之。速善因者，遞續不斷，而我國遂可物阜民康而無窮。

……願此仁王護國法會，年年舉行，則教化行而民生厚，人

<sup>59</sup> 祥雲：〈第二屆「仁王護國息災法會」南亭長老開示錄〉，《獅子吼》，13卷3、4期（1974年4月15日），頁6。

<sup>60</sup> 祥雲：〈第二屆「仁王護國息災法會」法會見聞散記〉，《獅子吼》，13卷3、4期，頁11。

<sup>61</sup> 《獅子吼》，14卷3期（1975年3月20日），頁37。

<sup>62</sup> 祥雲：〈第三屆「仁王護國息災法會」後記（上）〉，《獅子吼》，14卷4期（1975年4月15日），頁32。

人奉行佛道，深明佛理，先治一省，進治一國，天下不難邁進大同，干戈永息，則此五濁惡世，即五清淨土，即娑婆世界搖曳而成極樂矣。<sup>63</sup>

以仁王護國法會祈國運昌隆、元首康泰、災難消除是普遍的訴求，特別是在 80 年代之前，「政治」的性格十分明顯，主要原因是身處臺灣的中華民國國際地位每下愈況，一方希望藉著宗教「神奇」的力量扭轉不利的處境，另一方面藉以安定人心。而 80 年代之後，臺灣的國際地位雖不利，但經濟卻不斷地起飛，「仁王護國」雖然還是主軸，但也配合經濟繁榮之後社會風氣的變化而加入「淨化人心」、「社會祥和」等議題，例如臺北縣市佛教界於 1998 年 1 月 1 日至 3 日發起啟建仁王護國法會，淨良法師在法會緣起上說：「爾來人心乖違、道德不振、天災人禍、社稷多難，為祈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佛日增輝、世界和平……祈求佛力加被，其使消災解厄，啟發淨化人心、促進社會祥和，願此殊勝功勳，端為國運昌隆，元首、百官、人民祝福。」<sup>64</sup>當然仁王護國法會在 1949 年之後漸漸成為佛教界的傳統之後，到了 90 年代更成為每年一辦的例行公事。

以上如果對照《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2 所說的：「一切有情造惡業故，令諸國土種種災起，諸國王等為護自身、太子、王子、后妃、眷屬、百官、百姓、一切國土，即當受持此般若波羅蜜多，皆得安樂。」<sup>65</sup>並從仁王護國法會的時機及背景來分析，與「護國」、「祐民」的經典思想相合，這是無庸置疑的，正如祥雲法師所云：「『仁王法會』是匯合了政治與宗教（國家與佛教）的雙重意義而舉辦的民間活動。」<sup>66</sup>

<sup>63</sup> 仁化：〈萬國咸寧，人天安泰—政府首長民意代表正信大德啟建仁王護國法會之深義〉，《獅子吼》，14 卷 3 期，頁 6。

<sup>64</sup> 淨良：〈臺灣佛教界啟建仁王護國法會緣起〉，《中華民國八十七年開國紀念日臺灣佛教界啟建仁王護國法會專集》（臺北：臺北佛教雜誌社，1999 年 4 月）。

<sup>65</sup>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二·奉持品第七》，頁 0843a。

<sup>66</sup> 祥雲：〈第三屆「仁王護國息災法會」後記（上）〉，《獅子吼》，14 卷 4 期，頁 31。

## 伍、《仁王護國經》護國護民功能性觀點

啟建仁王護國法會甚至誦讀《仁王護國經》是與國家、社會、眾生的利益與福祉相關的，佛教在國家處於非常時期，以經典的功德迴向國運昌隆、人民利樂，是佛教經典所顯示的理念。民國時期的大陸國難方殷，無論是戰前或戰後，舉行仁王護國法會，正是居於祈求佛力「護國」、「護眾生」的功能性，例如 1942 年抗日戰爭期間，當時在重慶的國府主席林森就發起舉辦「仁王護國息災法會」。<sup>67</sup>又如 1948 年 9、10 月間，上海的屈文六（1883-1973）、潘公展二居士，鑑於內戰日益緊迫，難民如潮水向江南逃奔，便發起啟建「仁王護國息災法會」，並請南亭法師講經三晚。<sup>68</sup>

因此，在國家處於非常時期，佛教為了解除災難，救護國家、救護眾生，進而啟建仁王護國法會，乃是其關鍵所在。國府播遷臺灣，舉行仁王法會更是頻繁，那是因為自 1949 年起，臺灣的國際處境，充滿著詭譎與不確定所致，例如在 1972 年 9 月，由中佛會所啟建的護國息災法會，其有部分是指針對日本將與大陸建交一事，文曰：

姑息氣氛濃厚，國際間，唯利害是視，置道德於不顧，倘或任其氾濫，即此時代逆流，勢將淹沒世界。以近日匪勾結，所謂邦交正常化問題……。邇來，愛國志士，憂心如織，盱衡外交情勢發展，逆頓或所不免。佛眾，是以報四重，濟三途為懷，自當先憂後樂示範，檢束身心，端正行誼，運用佛法無上威力，扭轉世運，弘拓國運。……眾擎易舉，法力無邊，護國才能護教，愛教必先愛國。<sup>69</sup>

<sup>67</sup> 《菩提樹》，第 244 期，頁 48。又有說是 1943 年，林森、戴傳賢、居正等奉請虛雲老和尚及百位法師，在重慶市內及鄉外，小樑子長安寺各地分設兩壇，啟建仁王護國法會。參見程文熙：〈仁王護國經的內護和外護〉，《菩提樹》，第 244 期，頁 16。

<sup>68</sup> 陳慧劍：《南亭和尚年譜》，頁 99。

<sup>69</sup> 董正之：〈籲請舉行護國息災法會〉，《菩提樹》，第 238 期（1972 年 9 月 8 日），頁 8。

同樣的日本與中共建交前夕，與立法委員董正之一一起齊聲呼籲中佛會啟建仁王護國法會的圓香居士，也是居於佛法不可思議之威力，以扭轉不利局勢，文曰：

邪惡現象，雖不能阻我們反共復國的前途，不能說是一種最大的挫折，兼之今年入夏以來，天然災害，好像也不少，為了使國家早日復興，人民安泰，當此危急之秋，我們建議中佛教會，應從速籌備，啟建一次盛大的護國息災法會，為國祈福，為眾生消災……。

……幾點芻見，願提供參考，一者宜邀請政府首長，社會賢達，民意代表為法會發起人，以昭隆重，二者建議當局通令全國人民，全面禁屠一至三日或七日，各級地方機關，應儘可能勸導全國人民，於法會期間，實行齋戒一至三或七日，以示虔誠，三者由中佛會通告全省各大小寺院僧尼於法會期間，一律誦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蜜）多經，在家居士能誦經者誦經，不能誦經者，亦勸一律齋戒。四者邀請名家，就當前實際應興革的情事，提綱挈領，寫一懇切平實的懺悔發願迴向文，使人人能依之檢點和趣向。五者於法會進行中的重要程序，建議有關當局，通令三家電視臺，每日於所謂黃金時段，同時作實況轉播，俾使全國人民，皆能浸沈於虔誠的氣氛中。以上五者，若能一一做到，自能表示舉國一心，虔誠以赴，於是自可上達天心，下革鬼神，正義伸而邪惡隱，國運必日漸昌隆，反共大業，必然早日勝利成功……。<sup>70</sup>

《仁王護國經》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護國」、「護眾生」的經典，正如經上佛告波斯匿王所云：

一切國土，若欲亂時，有諸災難，賊來破壞，汝等諸王，應

<sup>70</sup> 圓香：〈請啟建護國息災大法會〉，《菩提樹》，第238期，頁8。



當受持讀誦此般若波羅蜜多，嚴飾道場，置百佛像，百師子座，諸百法師解說此經，於諸座前，然種種燈，敬諸雜花，廣大供養，衣服臥具，飲食湯藥，房舍床座，一切供飾，每日二時，講讀此經，若王大臣，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聽受讀誦，如此修法，災難即滅。<sup>71</sup>

依經典所載舉行仁王法會，咸信其功德最大，例如 1973 年 2 月的那場法會，在佛前設蔣總統及文武百官軍民長生祿位，報名法師一百六十多位，而到場誦經的法師就有一百九十九位。<sup>72</sup>1974 年 3 月間的仁王護國法會也是延請百位僧侶同誦《仁王護國經》，當時的嚴家淦副總統還親自前來上香。<sup>73</sup>這完全是依據《仁王護國經》所載的內容來實施的。經典又說：

諸國土中，有無量鬼神，一一復有無量眷屬，若聞是經，護汝國土，若國欲亂，鬼神先亂，鬼神亂故，即萬人亂，當有賊起，百姓喪亡，國王太子，王子百官，互相是非，天地變怪，日月眾星，失時失度，大火大水，及大風等，是諸難起，皆應受持講讀般若波羅蜜多經。<sup>74</sup>

《仁王護國經》中的「仁王」，是指當時印度的十六國國王，經曰：「一切人王，皆由過去侍五百佛，恭敬供養，得為帝王」，又說：「菩薩現諸王身，化導眾生……諸佛亦復如是。」是一切國王，皆是有大善根，有大善行之人，是故佛教於此，乃尊敬於國王，並有期望於國王。以尊敬於國王故，道場乃有諸種護國禪寺之名，供養必有國家元首之長生祿位。<sup>75</sup>

護國的基礎是由內而外，即先內護再外護，如波斯匿王問佛「護國法」，然釋尊先說「護佛果」與「護十地行」，意謂凡為國王者應有容乃大，而後可曰仁王。如不修仁，貪而無厭，嗔而侵害，癡而不明，即不免濫用權力，

<sup>71</sup> 《仁王護國波羅蜜多經卷二·護國品第五》，頁 0840a。

<sup>72</sup> 《菩提樹》，第 244 期，頁 48。

<sup>73</sup> 《菩提樹》，第 256 期，頁 2。

<sup>74</sup> 《仁王護國波羅蜜多經卷二·護國品第五》，頁 0840a。

<sup>75</sup> 程文熙：〈仁王護國經的內護和外護〉，《菩提樹》，第 244 期，頁 8-9。

傷害人民，自身尚不能護，又何能護國？<sup>76</sup>

佛在《仁王護國經》中表示：國有七難，即日月失度、星辰失度、四種火起、寒暑不常、暴風數起、天地亢陽、賊侵兵戈；而災難的起因有四，即一不孝父母、二不敬師長、三國王福盡，無道之時，聖人捨去、四國王大臣，不行正法。如前述，國難起時如先有內護，就可減少七難發生，同時嚴飾道場，供佛、燃燈、燒香、供花，每日誦經二次，請法師解說《仁王護國經》，如是即可使人心清淨、向善，如天助自助者，即有鬼神來聽，共護其國。<sup>77</sup>

戰後臺灣在講解《仁王護國經》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南亭法師，他至少講過《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要解》、《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意》、《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解》等，而他對《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的解題是：「具有仁民愛物的執政者一王一所以保護他國家的一部般若波羅蜜多經」。<sup>78</sup>

南亭法師在講解《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護國品》時，認為誦仁王般若退敵消災是可能的：

誦仁王般若，以之消災滅罪或抗拒敵人，以保護國家，有此可能嗎？據良賁疏言，本經譯者不空三藏曾修此法，感毘沙門天王現身，驚散敵兵，邊境獲免於難。因敕寺廟供天王像。道信大師於隋大業十三年領眾抵吉州，值群盜圍城，七旬不解，萬眾惶怖。祖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眾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依照這兩個故事來說：第一、要領導者是非常人，如不空、道信二大師。第二、要在非常時期，大眾免難心切，因而眾志成城。第三、要平

<sup>76</sup> 程文熙：〈仁王護國經的內護和外護〉，《菩提樹》，第244期，頁14。

<sup>77</sup> 程文熙：〈仁王護國經的內護和外護〉，《菩提樹》，第244期，頁14-15。

<sup>78</sup> 南亭法師：《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解》，收在《南亭和尚全集(三)》（臺北：華嚴蓮社，1991年9月），頁4。

素日日誦持，皆可感格天、龍天八部也。<sup>79</sup>

受持、讀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獲感應，佛史記載屢見不鮮，雖然「護國」、「祐民」的經典不少，但以《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所述最為具體詳盡，故戰後臺灣因國際現實問題，每每處於非常時期，皆以誦讀此經為首選，固非無因也。

另外，除了上述，當國家處於非常時期，舉辦仁王護國法會已是常態，而當社會發生災難或不靖時，佛教界也會舉辦同樣的法會，《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說：

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何故天地有是災難？佛言，大王由瞻部洲，大小國邑，一切人民，不孝父母，不敬師長，沙門、婆羅門、國王、大臣不行正法，由此諸惡有是難興。<sup>80</sup>

正如前述在 1998 年元旦，由臺北縣市佛教會聯合發起的仁王護國法會，其緣起就是基於社會動盪、天災不斷之故，自立法師就表示：「近兩年來，也許由於人類共業所感，整個國際皆充滿了不景氣的現象，而我們的寶島臺灣，更是多災多難。……在這天災人禍，連綿不斷的多事之秋，人心惶惶，寢食不安。臺北縣、市的佛教界，在淨良長老的領導之下，特別發起隆重舉行『仁王護國息災大法會』三天，兩百餘位的高僧大德，領導四眾虔誠誦誦仁王護國經；並恭請善導寺方丈一了中大和尚宣講仁王護國般若經的要意，以佛陀的慈悲法水，洗滌所有受污染的心靈，回復到我們本有的清淨與光明。」<sup>81</sup>

## 陸、結 語

<sup>79</sup> 南亭法師：《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解》，收在《南亭和尚全集(三)》，頁 162。

<sup>80</sup> 《仁王護國波羅蜜多經卷二·奉持品第七》，頁 0843b。

<sup>81</sup> 自立：〈從仁王護國般若經說起〉，《中華民國八十七年開國紀念日臺北佛教界啟建仁王護法會專集》，頁 189。

戰後臺灣例行的仁王護國法會，雖然也有使用鳩摩羅什所譯的版本，<sup>82</sup>但所根據的主要經典是不空三藏所譯的《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不空三藏又叫不空金剛，梵名 Amoghajāra，15 歲時事金剛智三藏受五部灌頂，及唐開元 20（732）年金剛智示寂，奉遣旨往五天、師子國，廣求密藏。天寶 5（746）年，還京，入內立壇，為帝灌頂。後祈雨止風有驗，賜號智藏，自天寶至大曆 6（771）年，譯出密部之經軌，凡 77 部，120 餘卷，密教之盛此時為最。<sup>83</sup>

由上可知，由於不空三藏密教的背景，其所譯的經典是具有密教色彩的，因此，戰後臺灣佛教在早期舉行仁王法會時，同立顯密二壇應該是有其根據的。不過，除了《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具有密教色彩之外，早期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為蒙古籍的章嘉大師，其藏密的背景，在戰後臺灣初次的仁王護國法會中，由他代表密教設壇祈福，不外是一種顯密平衡的考量，或許也因而成為傳統而沿用至今日。

佛教經典為法寶，咸認為乃世尊金口宣說，一方面是開示眾生成佛之道，一方面又是勸勉依法奉行，由於佛教徒咸信法寶具有無量功德，更具有不可思議感應，因此，依教奉行，以一切功德迴向眾生、社會、國家，則是佛教慈悲大愛的象徵，而《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以「護國」為明宗大意，當國家遭受災難或不靖時，舉行仁王法會，正是遵佛所制之舉，正如〈護國品〉云：「一切國土，若欲亂時，有諸災難，賊來破壞汝等諸王，應當受持讀誦此般若波羅蜜多，嚴飾道場，置百佛像，百菩薩像，百師子座，請百法師，解說此經」，佛、法、僧三寶具足，依經教奉行，則「災難

<sup>82</sup> 如由淨空法師所發起慶祝總統蔣經國、副總統謝東閔就職紀念而印的經典，就是鳩摩羅什譯本《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文曰：「淨空大法師於中國佛教會大講堂宣講，以此功德迴向眾生，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元首康寧、兆民樂利、一切有情普行仁慈、斷惡修善入般若慧登清淨地情與無情同圓種智」（標點為筆者所加）。參見〈慶祝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啟建仁王護國講席紀念〉，《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香港青山妙法寺版，未註明重印時間。

<sup>83</sup> 參見丁福保：〈不空〉條，《佛學大辭典》（卷上），頁 595。

即滅」，「一切所求，官位富饒，男女慧解，行來隨意，人天果報，皆得滿足，疾疫厄難，即得除愈，樞械百鎖，檢繫其身，皆得解脫，破四重戒，作五逆罪，及毀諸戒，無量過咎，悉得消滅。」<sup>84</sup>

仁王法會的舉行時機是很重要的，一般都是在社會、國家或領導者有非常事時舉辦，正如《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中，世尊要求十六國王奉持此經，當國王勤政愛民時，則國必大治，此是「內護」；國之大治，民必團結一致，自無憂於外敵，此是「外護」。所以仁王護國法會的核心意義，就是請求上位者勤政愛民，實施仁政，則社會、國家必然康寧。

對日抗戰之前仁王法會的訴求集中在消彌天災、人禍、戰爭；抗戰期間則以祈求退敵、護國為內容；1949年之後國府遷臺，臺灣佛教界在前20年間，為因應臺灣身處風雨飄搖的處境，仁王護國法會又以「鞏固領導中心」、「國運昌隆」為思考模式，圖以處理臺灣國際地位不利的變局。隨著經濟的起飛，法會祈求「國運昌隆」的訴求並沒有減少，但是因經濟繁榮所帶來的社會風氣改變，仁王法會也適時加入「淨化人心」等訴求，反應了時代的性格。90年代之後，仁王法會成為佛教界的例行公事，過去強烈的政治性格隨之淡化不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變成常見的主張。同樣一部《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隨著時局的推演，展現出不同的風貌，也可看出佛教適應社會與眾生而產生的文化樣貌。

---

<sup>84</sup>《仁王護國波羅蜜多經卷二·護國品第五》，頁0840a。

## 徵引書目

### (一)中文專書

《大正藏》，CBETA2006 年版。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卷上）。臺北：修訂中華大藏經會，1987 年。

不著撰人，《癸丑仁王護國息災大法會實錄·序》，1971 年。

中村元等，《中國佛教發展史》。臺北：天華公司，1984 年。

李子寬，《百年一夢記》。自署出版，1961 年。

法會專刊編委會，《仁王護國息災法會紀念專刊》。臺北：中國佛教會，1973 年。

南亭法師，《南亭和尚全集》。臺北：華嚴蓮社，1994 年。

祝賀恩師八智嵩慶禮贊會，《白聖上人光壽錄》。臺北：十普寺，1983 年。

陳慧劍，《南亭和尚年譜》。臺北：華嚴蓮社，2002 年。

道安，《道安法師遺集（八）》。臺北：道安法師紀念會，1980 年。

遠流臺灣館編，《臺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 年。

蔡運辰，《如是庵（念生）學佛賸語》。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 7 月。

戴季陶，《戴季陶先生佛學論集》。臺北：華嚴蓮社、菩提佛堂，1985 年。

釋妙然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臺北：海潮音雜誌社，1995 年。

### (二)日文專書

鎌田茂雄等編，《大藏經全解說大事典》。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98 年。

### (三)中文論文

仁化，〈萬國咸寧，人天安泰—政府首長民意代表正信大德啟建仁王護國法

- 會之深義》，《獅子吼》，14卷3期（1975年3月15日）。
- 太虛，〈佛教的護國與護世〉，《海潮音》，20卷1號（1939年1月15日）。
- 自立，〈從仁王護國般若經說起〉，《中華民國八十七年開國紀念日臺北佛教界啟建仁王護法會專集》。臺北：臺北佛教雜誌社，1999年。
- 淨良，〈臺灣佛教界啟建仁王護國法會緣起〉，《中華民國八十七年開國紀念日臺灣佛教界啟建仁王護國法會專集》。臺北：臺北佛教雜誌社，1999年。
- 淨空，〈慶祝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啟建仁王護國講席紀念〉，《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香港青山妙法寺版，未註明重印時間。
- 祥雲，〈第二屆「仁王護國息災法會」法會見聞散記〉，《獅子吼》，13卷3、4期（1974年4月15日）。
- 祥雲，〈第二屆「仁王護國息災法會」南亭長老開示錄〉，《獅子吼》，13卷3、4期（1974年4月15日）。
- 祥雲，〈第三屆「仁王護國息災法會」後記（上）〉，《獅子吼》，14卷4期（1975年4月15日）。
- 程文熙，〈仁王護國經的內護和外護〉，《菩提樹》，第244期（1973年3月8日）。
- 程文熙，〈佛教的四聖諦和仁王經的忍〉，《仁王護國息災法會紀念專刊》。臺北：中國佛教會，1973年10月。
- 圓香，〈請啟建護國息災大法會〉，《菩提樹》，第238期（1972年9月8日）。
- 葦舫，〈讀監察院于院長等致蔣總裁建立護國法會電後〉，《海潮音》，19卷9號（1938年9月15日）。
- 董正之，〈籲請舉行護國息災法會〉，《菩提樹》，第238期（1972年9月8日）。

#### （四）期刊消息

〈北京政府請太虛法師在中央公園社稷壇建設護國法會紀事一束〉，《海潮

音》，第6年第3期（1925年4月13日）。

〈重慶各界發起護國息（災）法會〉，《海潮音》，20卷3、4、5、6號合刊（1939年6月15日）。

〈孫中山先生治喪處覆函〉，《海潮音》，第6年第3期（1925年4月13日）。

《菩提樹》，第60期（1957年12月10日）。

《菩提樹》，第233期（1972年4月8日）。

《菩提樹》，第244期（1973年3月8日）。

漢口佛教會，〈普勸各地佛教叢林學社教會寺庵講讀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為國為世界祈求平安啟〉，《海潮音》，第3年第5期（1922年6月16日）。

戴傳賢，〈仁王護國法會發願文〉，《海潮音》，第13年第5期（1932年5月15日）。